

乡村美学赋能基层党组织文化领导力的内在逻辑与创新实践

丁辉侠 李祎琪

摘要: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背景下,文化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铸魂工程,亟须创新实践路径。乡村美学以自然生态与人文传承为根基,通过具象化、情感化的审美载体,为赋能基层党组织文化领导力提供重要工具。乡村美学赋能基层党组织文化领导力的逻辑内核,在于以价值引领为纽带,通过实践创新与制度重构,激活基层党组织的文化领导力潜能,增强乡村社会文化认同,重构城乡社会结构变迁中的乡村治理秩序。但在乡村振兴实践中,乡村美学赋能基层党组织文化领导力面临文化认同危机、治理能力赤字和资源约束困局三重挑战。为此,需要以美兴业,夯实经济基础;以美育人,筑牢群众基础;以美塑形,创新实践载体;以美固制,完善制度体系。从而破解乡村文化治理困境,强化基层党组织文化引领功能。

关键词:乡村美学;基层党组织;文化领导力

中图分类号: D267; F3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6)01-0042-08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是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重要任务。“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1],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铸魂工程。在城镇化快速发展背景下,传统文化受到严重冲击,文化振兴更需要文化领导力。基层党组织的文化领导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领导力的基础底座,有助于将国家治理中的政治话语转化为村民普遍认同的乡村治理共识,从而凝聚乡村治理合力,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而在乡村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迁的背景下,基层党组织的文化领导力也受到重大挑战,亟须有效提升以适应乡村全面振兴需求。乡村美学根植于乡村自然生态、人文传承和生产生活,可将乡村文化中抽象的价值观念、历史记忆与民俗传统,转化为可感知的美学符号载体,其重要任务是认识和保护乡村传统文化^[2]。因此,乡村美学为乡村文化领导力提升提供了新的方法路径。已有研究在基层党组织文化领导

力和乡村美学方面都进行了探索。在基层党组织文化领导力方面,有学者认为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中国共产党组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领导力在党的领导力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3]。文化领导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建设领域所展现的引领、指导和整合能力^[4]。但也有学者发现,一些村级党组织引领先进性文化建设的动力不足,导致村庄精神文明建设滞后,甚至出现倒退现象^[5]。关于乡村美学的研究,特别强调其在促进乡村文化认同方面的重要作用,这是因为乡村美学涵盖自然生态、伦理秩序与生活智慧三重内涵,既承载着传承乡村文化基因的重要功能,也是快速城镇化进程中重塑乡村文化认同的重要工具^[6]。也有研究强调,只有契合乡村文化特质的美学设计才能增强居民对本土文化的认同^[7]。实践证明,乡村美学可为基层党组织文化领导力提供丰富的资源载体与方法路径,但将二者结合在一

收稿日期:2025-10-1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数字减员促进基层干部担当作为的机制与路径研究”(25BZZ068)。

作者简介:丁辉侠,女,郑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郑州大学公共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员(河南郑州450001)。李祎琪,女,墨尔本大学艺术文化管理专业研究生。

起的研究较少。基于此,本文立足“乡村美学如何赋能基层党组织文化领导力”这一核心命题,试图系统剖析乡村美学赋能基层党组织文化领导力的内在逻辑、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切实可行的实践路径,以期提供新的方法思路。

一、乡村美学赋能基层党组织文化领导力的内在逻辑

乡村美学源于乡村的美,其中蕴含着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独特的地域文化符号与动态平衡的治理智慧。因此,乡村美学可从价值引领、实践转化和制度重构三个方面赋能基层党组织文化领导力,从而激活基层党组织文化领导力潜能,增强乡村社会的文化认同。

(一) 价值引领:以美学共识夯实基层党组织文化领导力根基

价值引领是基层党组织文化领导力的核心功能,而乡村美学所具有的具象化、情感化和人文化特质,成为连接政治话语与乡土认同的关键纽带,这主要通过美学转译、示范引领和记忆联结三种路径来实现。

1. 美学转译:乡村美学把基层党组织的政治话语转化为乡村发展愿景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落实党和国家战略与政策目标的关键力量。在治国理政实践中,诸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振兴”“共同富裕”“城乡融合”等宏观政策表述,需转化为对村民具有感召力与吸引力的地方性发展愿景。乡村美学以其独特的叙事框架,能够将这些抽象目标转译为村民能够共情的乡土话语体系。例如,立足生态美学维度,可借助“天人合一”这一传统哲学理念,将“生态文明建设”转化为对生态家园的共同守护与集体认同;立足伦理美学维度,“崇德尚礼”的乡土价值传统可将“文化振兴”具体诠释为孝亲敬老、邻里和睦的乡村风尚。通过这种转译机制,乡村美学不仅助力基层党组织为政策目标注入深厚的乡村文化内涵,更使其逐步演化为凝聚共识的乡村共同愿景。这一过程既使价值引领更贴近村民的日常生活与实践逻辑,也更容易在情感与目标层面唤起村民共鸣,推动形成面向未来的乡村发展合力。

2. 示范引领:乡村美学推动基层党组织以实际行动塑造价值认同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

根、民族和睦之魂”^[8],其生成离不开具体、可感的社会实践。基层党组织文化领导力的有效发挥,关键在于融入群众日常生活,并通过以身作则的示范行动凝聚共识、促进认同。乡村美学恰恰为这种示范提供了系统化的实践载体与表达形式。在实践中,基层党组织可通过支持修复古建筑、传承手工技艺、举办节庆庙会等文化项目,将抽象的价值理念融入村庄的物质空间与集体活动之中。这些举措不仅美化了人居环境,也活化并传承了优良的地方生产习俗与生态智慧,生动践行了生态文明与乡村振兴理念。由此,价值观的传递方式得以从单向度的政策解读,转向具身化的、参与式的示范引领。这种可视、可感、可参与的美学实践,显著增强了党组织的感召力与亲和力,使村民在切身体验与情感共鸣中,自然而然地深化对乡土文化及其内蕴价值的认同,从而筑牢乡村治理的情感与价值根基。

3. 记忆联结:乡村美学用集体叙事帮助基层党组织编织价值网络

价值引领的深层实现机制,根植于情感共鸣与集体记忆的有机联结。乡村美学注重挖掘村庄发展历程、典型人物与重要事件中蕴含的美学意蕴,借此将宏大的国家叙事、历史进程与社会发展,与具体可感的村庄记忆深度融合,构建起一种“有温度”的集体叙事。在这一过程中,基层党组织通过主导或参与对村庄历史、人物事迹、文化传统等美学资源的系统梳理与再现,引导村民在回溯共同记忆的过程中,感知文化根脉、理解发展脉络,从而增强对村庄的归属感、荣誉感与认同感。这种基于美学叙事的集体记忆重塑与价值意义重构,不仅能够缓解因市场经济冲击而可能导致的价值观念疏离或外来文化过度植入,更能在情感与心理层面建立起牢固且可持续的村庄认同。由此,乡村美学通过叙事整合与记忆激活,为基层党组织强化文化领导力奠定了坚实的心理与社会基础。

(二) 实践转化:以美学创新激活基层党组织文化领导力潜能

乡村美学不仅是一种静态的审美资源,更是一种可操作易接受的动态实践框架。通过空间再造、产业赋能、参与共创和数字传播四个维度,乡村美学为基层党组织文化领导力提供多元实践载体,推动文化引领从价值理念到治理行动的有效转化。

第一,空间再造,以美学重塑乡村公共空间并激活其社会价值。公共空间作为乡村文化生活的物质载体,其形态与活力直接影响基层文化治理效能。

当前,不少乡村面临公共空间面积局促、功能单一、村民参与度不足等现实困境,这在客观上制约了基层党组织文化引领作用的发挥。借助乡村美学的理念与方法,可以对村庄内闲置宅基地、街巷转角、河塘岸线、废弃打谷场等“消极空间”进行系统性改造与品质提升。此类空间再造旨在通过设计介入与社会协作,重新激活这些场所的公共属性与文化功能,使其转化为具有认同感与归属感的集体场域。这一过程强调以村民参与为基础,通过共同规划与运维,在实践中有机培育村民的公共精神、合作意识与自治能力。同时,更新后的乡村公共空间也为村庄文化活动和组织动员提供富有吸引力的空间场所,从而在实践活动中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文化领导力。

第二,生产生活嵌入,以美学融合激发村庄内生发展动力。乡村美学根植于乡土社会,其生命力来源于与村民日常生产生活的深度融合。乡村美学视角下,基层党组织可推动美学理念与实践向乡村产业与日常生活渗透,从而实现文化引领与内生发展的有机结合。例如,通过引导发展融合生态美学与景观美学的观光农业、休闲农业,将农田景观、农耕文化与乡村旅游相结合。或支持对传统手工艺、地方美食等非遗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借助品牌塑造、体验式设计等手段,提升其审美内涵与市场价值。这些举措不仅优化了乡村人居环境,也使村民在参与过程中直接获得经济收益与文化满足,切实感受到“美”所带来的综合效益。这种可直接获益的转变,让村民在实际生产与生活体验中,直观体会到基层党组织推动发展的务实导向与文化引领的实际成效,从而在情感与行动上更加认同并自觉追随其村庄发展理念,形成持续的内生动力。

第三,参与共创,以美学实践强化村民主体意识与归属感。文化领导力的根本在于真正激发村民的主体性与创造性,使其在文化活动中实现从参与、创造到共享的全程融入。乡村美学本质上是一种参与式美学,以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发挥被领导者的积极性^[9],引导村民在共创共美的实践中成为乡村文化的主体。具体而言,可通过组织村民共同参与村景设计、乡土故事征集、民俗节庆策划等活动,鼓励他们主动发掘、讲述并传播身边的美。这种深度参与本身即是一种生动的文化动员与潜移默化的美育实践,使村民逐渐从文化活动的旁观者,转变为乡村美学的主动创造者与文化成果的直接享有者。与此同时,依托此类共建共治共享的机制,村民在共同劳作与创造中不断强化对村庄共

同体的情感依附与身份认同,也进一步增进对基层党组织引领作用的信任与追随。从而使文化领导力在集体参与、共同创造中自然生长、具身体现。

第四,数字传播,延展基层党组织文化引领的时空维度。数字技术的广泛渗透与深度应用,为基层党组织突破文化引领的物理边界、拓展其影响半径提供了现实可能。通过构建在线村史馆、直播乡土生产生活场景、制作非遗技艺短视频等数字化形式,能够系统化地呈现乡村的自然景观、文化遗产与美学实践成果。此类数字传播活动不仅面向外部,吸引社会关注,带动乡村旅游与文化产业,也向内凝聚情感,使长期在外工作生活的“流动村民”得以持续感知家乡变迁,在数字空间中维系并深化其村庄认同。由此,数字传播不仅扩大了基层党组织文化工作的覆盖范围,更以轻量、日常、交互的方式,将价值引领嵌入线上社群与跨地域交往之中,实现了在真实场域与虚拟空间双重维度中的整体性文化引导,彰显其在数字时代的适应性及引领力。

(三) 制度重构:以美学基因构建基层党组织文化领导的长效机制

乡村美学赋能基层党组织文化领导力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制度是人们共同遵守的办理规程或行为准则^[10]。制度重构的核心是将乡村美学理念和实践嵌入乡村治理体系,形成社会成员共同认可的行为规范和模式,从而建立乡村美学基因与基层党组织文化领导力的双向互嵌机制。

一是在乡村治理制度中嵌入乡土审美和文化基因。在村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持续流失的背景下,基层党组织要不断创新乡村文化传承方式,以文化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将乡村美学理念融入制度建设,可引导基层党组织在制定村庄发展规划、产业布局方案及人居环境整治措施等制度时,有机融入美学要素。这类蕴含乡村美学特质的制度安排,不仅有助于保护和延续乡村文化特色,通过常态化、制度化的美学实践强化乡村文化基因,也因其贴近村民的审美传统与文化心理,更易获得认同与自觉履行,从而在治理执行层面形成内在驱动力。由此,乡村美学为基层党组织的文化领导力提供了兼具文化延续性与实践适应性的柔性制度支撑。

二是构建多元协同机制,凝聚乡村文化治理合力。乡村美学实践广泛牵涉基层党组织、县乡政府、村“两委”、村民、社会组织及市场主体等多方力量,其开展过程天然要求并推动着协同机制的建立与完善。在此过程中,美学实践能够促进各方权责利关

系的清晰界定与动态协调,从而激活“党组织领导、村委会落实、村民主体、专业赋能、社会参与”的协同共治框架。该框架既强化了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又有效调动了社会多元力量的积极性,实现了组织引领与社会活力的有机统一。同时,通过美学项目的联结,宣传、文旅、农业、自然资源等职能部门得以突破条块分割,在政策、资源与行动上形成协同,有助于整合原先分散的治理资源,系统提升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文化治理中的统筹力与综合效能。

三是建立评价激励制度,推动乡村文化领导力不断提升。乡村美学是实践美学,兼顾自然生态、乡村文化、村民参与、治理创新等多重维度。乡村美学对乡村文化独特贡献在于其对乡村文化的坚守和创新,让乡村传统文化在乡村发展中展现时代价值,让乡村当代文化现象发展为乡村文化的一部分。基层党组织通过完善村庄治理制度,对在乡村美学实践中表现突出的个人、家庭或团体给予荣誉表彰与物质奖励,并将其与文明家庭评选、信用积分等挂钩。这种制度化的评价与激励机制,引导村庄发展和村民行为向兼具审美内涵与文化深度的方向发展,更能体现基层党组织文化领导力的时代价值。

二、乡村美学赋能基层党组织文化领导力的现实挑战

在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背景下,乡村美学有效赋能基层党组织文化领导力,面临来自于文化认同、治理能力和资源供给等方面的压力。这些挑战既源于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深刻变迁所带来的记忆传递链条断裂和符号失能,也受制于基层治理主体认知与行动逻辑的现代性脱节,亦暴露出当前制度供给与村庄资本流失的结构性矛盾。

(一)文化认同危机:记忆传递链条断裂与符号失能双重冲击

乡村美学赋能基层党组织文化领导力的前提是村民对本土文化的认同,而当前乡村最大的困境是认同感的困境^[11]。在城市化进程对乡村传统文化持续冲击背景下,基层党组织依托乡村美学构建文化认同面临多重挑战。

一方面,乡村美学实践本质上是对乡土文化价值的重构。但城市化进程中,传统建筑技艺失传、民俗仪式功能异化、方言使用场域萎缩等,加速乡村文化生态失衡,文化记忆的传递链条出现代际断裂现象。2017年发布的《中国传统村落保护调查报告》

显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传统村落的数量急剧下降。而中国1300多项国家级“非遗”和7000多项省级、市级、县级“非遗”,很大部分在传统村落里,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面临着后继无人的窘境^[12]。在此背景下,基层党组织在文化领导中面临认同危机。同时,在城市化进程中,青年群体对传统文化符号的陌生和疏离,也对文化记忆的再生产链条造成较大冲击,基层党组织依托传统价值构建认同的努力面临“代际真空”。这种文化传承的代际断裂削弱了乡土根基,基层党组织试图通过传统美学资源构建文化认同,但面临老年人认同而年轻人普遍不感兴趣的困境,文化领导缺少青年群众基础。

另一方面,在消费主义裹挟下,过度市场化的乡村文旅开发和千村一面的景观化陷阱,正在解构乡村文化的主体性。这种去乡土化和缺少群众参与的村庄建设和改造,实质上是城市审美对乡村发展的误导,偏离记住乡村历史和打造乡村未来的基本方向,从而导致文化符号出现失能现象。同时,一些地方自媒体为迎合都市想象,在乡村短视频内容中刻意放大“土味”元素。这种过度强调文化符号的功利化现象,正在人为割裂村民和乡村的情感联结。因此,千村一面的乡村美学设计,既不能增加乡村文化认同,也难以有效赋能基层党组织文化领导力。而基层党组织则在其中陷入两难选择:若顺应城市审美改造乡村,将丧失乡土文化本真性;若坚守乡村传统,则面临乡村旅游吸引力不足问题。在此背景下,基层党组织文化领导的话语权和权威性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

(二)文化领导力薄弱:主体认知与行动逻辑的现代性脱节

文化领导力是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地位和实现执政目标的重要力量^[13]。乡村美学赋能基层党组织文化领导力需要以村“两委”为主要构成的基层党组织成员具备文化领导能力,但当前基层党组织在认知理念、动员方式、专业能力上的不足,导致赋能实践在落地方面存在诸多困难。

首先,乡村振兴实践中,地方政府GDP至上思维依然存在。一些地方将乡村美学简化为经济工具或政绩工程,简单地理解为道路硬化和墙面彩绘类的物理改造,忽视乡村文化内涵的挖掘。也有部分地区将乡村美学等同于乡村旅游开发,过度商业化导致美学资源被破坏。这种工具理性主导的简化认知,忽视了价值理性的基础性和导向性作用,致使乡

村美学未能承担起乡村社会关系重构和激活村民参与的基本功能。同时,部分基层干部对文化治理的理解仅停留在“送戏下乡”“文艺汇演”等表面形式,未能理解美学赋能的实践逻辑,忽视美学活动本身还具有凝聚村民共识和传承文化记忆的功能作用,从而不能实现基层党组织文化领导的精神感召力借此提升的效果。

其次,基层党组织未能与时俱进,仍然沿用传统的运动式群众动员模式,难以适应文化治理的柔性需求。乡村美学是乡村与美学的结合体。乡村是基层群众生产和生活的地方,以村民为主体的基层群众是乡村的主人,乡村美学实践需要村民的深度参与。而带有明显科层制色彩的传统动员模式,更多的是传达和落实上级关于乡村美学实践要求,部分基层党组织没有用好群众路线工作方法,在乡村美学实践环节中忽视村民的深入参与,忽视文化治理所需的情感共振与价值共创。这不但会弱化基层党组织的文化领导权威,也会使乡村美学实践陷入投入高而成效低的发展困境。

最后,基层干部知识结构不能满足文化领导的专业性需求,治理能力不足而降低乡村美学赋能的效果。许多乡村虽拥有丰富的自然景观与人文历史资源,但因缺乏专业指导,无法将其背后的美学价值与文化故事完整呈现,难以转化为基层党组织文化治理的有效素材。专业能力的不足还体现在美学实践的同质化,部分地区照搬照抄其他乡村的成功经验,却未结合本地自然条件与文化特色。这不仅浪费了乡村的美学资源,而且会削弱基层党组织的文化领导力。

(三)资源约束困局:制度供给与资本流失的结构性矛盾

乡村美学是一项系统工程,其有效赋能基层党组织文化领导力需要制度、资金、人才、社会资本协同发力,推动发现乡村美学资源和开展乡村美学实践。但当前存在的制度和资源供给方面的结构性矛盾,制约了基层党组织文化领导力的效能释放。

一方面,现有制度供给面临政策工具碎片化的结构性困境,难以支撑乡村文化治理需求。中央强调“文化振兴与生态振兴协同”,但宣传、文旅、农业、自然资源等部门的政策工具较为分散。例如,文旅部门的非遗保护资金与农业部门的“美丽乡村”建设资金无法统筹使用,不利于村级美学资源整合。同时,一些乡村美学资源权属不清,资源开发受到阻力。乡村美学实践也缺乏稳定的资金支持,村民参

与积极性不足。制度碎片化还体现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脱节,一些地方的村规民约中虽纳入美学内容,但与绩效考核、财政支持等正式制度缺乏联动。总之,政策工具的分散化会对基层党组织的文化资源整合能力产生消极影响,不仅加重乡村美学实践中基层党组织的工作负担,而且不利于乡村美学价值通过制度化渠道转化为基层党组织可持续的文化领导力。

另一方面,乡村社会资本的持续流失进一步放大制度供给不足的结构矛盾,增加基层党组织通过既有治理框架凝聚共识的难度。乡村人口外流导致“空心村”增多,以血缘、地缘、业缘为基础的乡村信任网络逐渐破裂,规范乡村治理的非正式制度约束力下降。村庄青壮年劳动力不足,代际价值差异又导致青年群体对集体事务的参与意愿下降,村庄的集体行动力受到冲击。同时,在市场化冲击和消费主义影响下,村庄文化、习俗等非正式制度的约束力不断下降,村民的公共精神弱化,不利于村庄集体资产和公共空间维护。在此背景下,乡村美学实践因缺乏村民、乡贤、社会组织的协同参与,导致一些地方出现“干部干、群众看”的消极现象,这不仅制约了乡村美学在重塑文化认同与价值引领中的功能性表达,而且使得乡村美学不能有效赋能基层党组织的文化领导力。

三、乡村美学赋能基层党组织文化领导力的实践路径

针对乡村美学赋能基层党组织文化领导力面临的现实挑战,需从经济支撑、群众基础、治理效能、制度保障四个维度,推动乡村美学与基层党组织文化领导力深度融合,从而实现以美兴业、以美育人、以美塑形、以制固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一)以美兴业,夯实基层党组织文化领导力的经济根基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基层党组织应根据美学经济原理,将乡村美学资源转化为审美资本,实现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协同转化,为基层党组织文化领导力提供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

一方面,着力培育美学资本,推动从资源挖掘到价值转化的有效衔接。美学资源是美学价值的载体。乡村中蕴含的自然生态、建筑聚落、风土人情、手工技艺等各类物质或非物质要素,均是乡村重要的美学资源。首先,开展美学资源普查与符号提取。

上级可牵头组建包括专业团队、基层党组织和村民代表共同参与的普查小组,详细记录村庄每一处景观资源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植被类型、建筑风格等信息,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典故、民俗传说等,构建乡村美学资源数据库。同时,有效识别乡村美学的核心元素和特色优势,提炼出具有地域辨识度的乡村美学符号。其次,深入挖掘乡村美学资源的文化内涵,开展叙事重构,实现“一资源一故事”。在自然景观层面,阐释其生态美学价值,传递生态保护理念;在人文资源层面,挖掘代表家族文化、地方民俗、民族精神的民俗活动与民间艺术等,阐述其所承载的历史记忆、地方文化和社会价值观,从而增强文化吸引力。例如福建的土楼,不仅是建筑美学的典范,更蕴含着家族团结和防御智慧,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最后,推动载体创新与多维价值转化。依托教育基地、文旅产品、数字平台等,实现美学资源多元变现。在教育基地方面,通过建设“乡村研学基地”,吸引游客体验传统建筑修复、非遗技艺等;在文旅产品方面,开发“美学+文创”产品,把美学资源转化为市场价值;在文化传播方面,依托数字平台扩大乡村文化传播半径。通过拓展“资源—符号—产品—价值”链条,让乡村美学成为乡村产业发展的引擎,从而为基层党组织文化领导力提供经济支撑。

另一方面,激活美学经济,推动传统产业与美学资源融合。基层党组织应积极探索乡村美学与产业发展的融合路径,将美学元素融入乡村产业发展,打造特色产业品牌。通过推动传统产业审美化和审美资源产业化,实现文化价值向经济价值的转化。在传统产业审美化方面,聚焦农业升级,推动“农业+美学”融合,吸引游客参观旅游。在审美资源产业化方面,引入专业文旅企业,合作开发乡村美学体验项目,吸引游客参与,带动餐饮、民宿等关联产业发展。同时,美学经济发展也需要解决内在动力机制缺失、内外两种动力耦合机制失衡等问题^[14],建立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村民参与的驱动机制。

需要指出的是,乡村美学赋能基层党组织文化领导力并不是基层党组织单一主体可独立完成的,既需要政府提供政策支持,也需要市场主体等参与者投资与运营,更离不开村民以土地、房屋、技艺入股,共享收益。例如河南修武县大南坡村的美学经济,即是政府牵头,给予基础设施支持,村民以土地、房屋、人力等作为投入资源,从而形成的“利益共同体”。总之,通过聚合乡村美学场域的内外合力,既

能通过美学经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又能夯实基层党组织文化领导力的经济根基。

(二)以美育人,筑牢基层党组织文化领导力的群众基础

乡村美学赋能基层党组织文化领导力的本质,在于通过美学实践激活村民参与意识,凝聚乡村文化共识,传承与发展乡土文化,重构村民与乡村之间的情感联结方式,从而促进乡村全面发展,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感召力、凝聚力和文化领导力。

首先,强化党建引领,开展多元活动。乡村美学建设须将“美”嵌入乡村社会关系中。基层党组织应将乡村美学实践与基层党建工作深度融合,打造“党建+美学”系列活动,将乡村美学事务嵌入村民生产和生活中,在美学实践中推动乡村治理。一方面,加强基层党组织资源整合力和文化引领力。对于红色资源比较丰富的村庄,可以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红色教育课堂,凝聚情感共鸣,重构集体记忆,强化党组织意识形态话语权,使基层党组织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坚强战斗堡垒。另一方面,以乡村美学丰富乡村文化生活。基层党组织可鼓励村民自编自演与乡村生活、传统习俗相关的文艺节目,将村庄的历史故事、生活习俗等进行生动呈现。这既激发村民参与热情,增强村庄认同感,也有利于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与动员群众的能力。

其次,构建多元共治机制,推动村庄治理从主体协同到能力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文化领导力也体现在对多元主体的动员和协同能力方面。这就需要在乡村美学实践中构建多元共治框架,明确政府部门、基层党组织、村民组织、文化机构、市场主体等各主体职责。其中,政府部门提供政策与资金支持,基层党组织发挥政治引领与统筹协调作用,村民组织负责收集村民需求与监督实施,文化机构提供专业指导,市场主体负责产业运营,村民全程参与并享受乡村美学带来的各种物质和非物质收益。通过多元主体协同与能力建设,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乡村美学赋能格局,强化村民文化价值认同,夯实基层党组织文化领导力的群众基础。

最后,实施乡村美学治理能力提升工程。这就需要上级党委和政府针对村干部等基层党组织的核心力量,开展系列专题培训,内容涵盖乡村美学常识、文化资源开发、文化活动策划等,提升其统筹协调能力。针对村民,可开设“乡村文化讲堂”,强化他们对传统技艺、环境美化等的认知,培育乡村振兴中的“乡村美学带头人”,吸引青年群体加入。针对

各类乡村文化人才分类培训,如针对非遗传承人,可推动建立“非遗传承人+设计师”的合作机制,推动传统技艺与现代审美结合,提升其文化创新能力。当然,这也对基层党组织文化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只有基层党组织文化领导力不断提升,才能承担起文化领导使命。

(三)以美塑形,创新基层党组织文化领导力的实践载体

乡村美学不仅是乡村外在风貌的体现,更是乡村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的创新表达。基层党组织可将美学理念融入乡村治理全过程,通过空间改造、风尚培育、数字赋能,创新文化领导力的治理载体,从而实现治理精细化、人性化、艺术化。

首先,打造美学空间,优化乡村人居环境。对于开展乡村美学实践的村庄,上级部门可支持基层党组织牵头制定本村的《乡村美学空间规划》,在关注保护乡村传统文化、自然风景和建筑风貌的同时,也能满足现代生产和生活需求。在公共空间方面,打造乡村美学空间体系,为村民提供休闲娱乐与文化交流的场所。在民居改造方面,制定美学改造的约束性要求,明确对传统建筑元素的保护条款,同时允许适度融入太阳能路灯、污水处理系统等现代设施,避免传统民居改造过程中出现“一刀切”现象,做到既保留乡愁记忆,又提升居住品质。

其次,培育乡村美学风尚,引领文明乡风与价值认同。基层党组织可将美学理念融入村规民约。在生态保护方面,明确对垃圾分类、植被保护等方面的具体要求,可通过“积分制度”激励村民积极参与。在伦理道德方面,开展“美学+家风”建设,将优良家风以书法、绘画、文艺演出等文化活动形式展示,引导村民崇德向善,文明生活。同时,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通过“文化传承人”“文明家庭”等评选活动,宣传先进典型事迹,营造见贤思齐的文化氛围,让美学风尚成为村民的自觉追求。

最后,推动数字赋能美学实践,拓展文化治理半径与效能。基层党组织需与时俱进,运用新媒体与数字技术,创新乡村美学赋能方式。一方面,上级可支持在现有区域数字平台的基础上打造“乡村美学数字平台”,设置“美学资源”“村民议事”“需求反馈”等板块,村民和公众都可线上浏览乡村美学资源并提出治理建议,基层党组织及时回应并调整乡村文化治理策略,提升治理的精准性;另一方面,基层党组织利用短视频平台,组织党员、村民拍摄乡村美景、美食和民俗,通过生动直观的内容吸引外部关

注,在提升乡村知名度的同时增强村民的文化自豪感。

(四)以美固制,完善基层党组织文化领导力的制度体系

乡村美学持续赋能基层党组织文化领导力需要制度保障。当前乡村文化治理中存在的资源碎片化、权责模糊化、动力不足等问题,本质上暴露出现行制度供给与治理需求间的结构性张力。因此,需要从制度体系构建、政策工具创新、法治保障强化三个维度系统推进顶层设计,为基层党组织文化领导力建设夯筑制度根基。

首先,构建纵向贯通与横向协同的制度框架体系。在纵向层面,推动中央、省、市、县和乡五级联动,明确基层党组织在乡村美学实践中的职责权限;完善乡村文化资源确权登记制度,明确资源保护的标准与流程;将乡村美学因地制宜纳入基层党建述职评议,并作为乡村振兴考核指标的加分项;各乡镇可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横向层面,建立跨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协同宣传、文旅、农业、自然资源等部门,统筹财政资金、项目审批、资源分配等事项,集中支持乡村美学项目。同时,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实现各部门美学资源、项目进展等信息实时共享,避免资源浪费与政策冲突。

其次,创新刚性约束与柔性激励相结合的政策工具。针对不同领域,采用差异化政策工具。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实施刚性约束,划定传统村落、古树名木的保护红线,对违规者依法依规处罚。在美学经济培育领域,采用混合型工具,对“美学+文旅”项目给予税收减免、贷款贴息,对带动村民增收的企业给予奖励。在乡风文明建设领域,运用柔性激励,如开展“乡村美学示范村”“美学治理先进个人”评选,给相关村庄和个人荣誉表彰与物质奖励,激发其积极性。还应推动将乡村美学相关理念与行为规范纳入村规民约,明确村民在维护公共空间、参与民俗活动等方面的责任,同时保障其对乡村美学项目决策与收益共享的合法权利,形成制度约束与内在激励相结合的持续机制。

最后,强化法治保障与数字赋能的双重支撑体系。应着力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细化和落地,明确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文化资源配置、项目实施与监督中的法定角色与职能,保障其在文化治理中的主体地位,从而依法促进乡村在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等方面的独特功能得到持续发挥。同时,依托现有的政府数字平

台,搭建乡村美学数字平台,探索运用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对乡土景观、非遗技艺、村落档案等美学资源进行确权存证,确保资源的归属清晰、利用规范、传播有序。

结 语

基层党组织文化领导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乡村振兴中直接影响乡村文化发展方向与整体振兴成效。面对城镇化与乡村资源流失的现实,提升这一领导力已成为破解文化生态失衡、推动文化振兴的关键。乡村美学不仅提供了观察乡村的审美视角,更成为增强基层党组织文化引领力的创新路径。本文从美学与党建交叉视角出发,既拓展了乡村文化治理的理论视野,也为实践提供了可操作的行动框架。未来,仍需在政策协同、资源可持续利用、青年参与激励与数字技术融合等方面进一步深化探索。

总之,乡村美学与基层党组织文化领导力的结合,是文化振兴的方法创新,也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有益实践。这是一项系统工程,既需要美学实践深入融入乡村文化传承,也离不开党组织文化领导力的持续提升。只有立足乡村实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党的群众路线,才能在两者的良性互动中激活乡土文化内生动力,最终建成具有认同感、归属感与生命力的和美乡村。

The Theoretical Logic and Innovative Practice of Empowering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Cultural Leadership Through Rural Aesthetics

Ding Huixia Li Yiqi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comprehensively advanc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as a soul-forging project, urgently requires innovative implementation paths. Rooted in natural ecology and cultural heritage, rural aesthetics provides an important tool for empowering the cultural leadership of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through tangible and emotionally resonant aesthetic carriers. With value guidance as the link, aesthetic consensus consolidates the foundation of cultural governance for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The core logic of empowering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cultural leadership through rural aesthetics lies in activating their potential for cultural leadership through practical innovation and institutional restructuring, enhancing cultural identity in rural society, and reconstructing rural governance order amid changes in urban-rural social structures. However, in the practic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is empowerment faces three key challenges: a cultural identity crisis, a governance capacity deficit, and resource constraint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industries through aesthetics to consolidate the economic foundation; educate people through aesthetics to strengthen the mass base; shape rural forms through aesthetics to innovate practical carriers; and consolidate institutions through aesthetics to improve the institutional system, thereby resolving the dilemma of rural cultural governance and strengthening the cultural leading function of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Key words: rural aesthetics;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cultural leadership

责任编辑: 弈 寒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49.
- [2] Arriaza M, Canas-Ortega J F, Canas-Madueno J A, et al. Assessing the visual quality of rural landscapes [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04(1): 115-125.
- [3] 李琳.基层干部文化领导力的价值意蕴、向度逻辑与实践进路[J]. *领导科学*, 2025(5): 52-58.
- [4] 李玮琪,何欣峰.数智时代党的文化领导力建设:挑战、机遇和路径[J]. *领导科学*, 2025(6): 39-46.
- [5] 张志胜.弱化与重构:欠发达地区村级党组织领导力研究——基于皖北农村的调查[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5): 39-44.
- [6] 杨守森.中国乡村美学研究导论[J]. *文史哲*, 2022(1): 131-144.
- [7] Howley P. Landscape aesthetics: Assessing the general public's preferences towards rural landscapes [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11(72): 161-169.
- [8]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285.
- [9] 蔡礼强.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核心特质与主要优势[J]. *甘肃社会科学*, 2024(3): 1-10.
- [10] 李拓.制度领导[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2:50.
- [11] 张熙,杨冬江.从“乡村美化”到“和美乡村”:新时代“美丽乡村”的内涵变化、建设路径及价值探析[J]. *艺术设计研究*, 2023(3): 69-74.
- [12] 李向军,王晓波,王斯敏,等.中国传统村落保护调查报告(2017)[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6-7.
- [13] 王永友,梁志玲.论新时代党的文化领导力的提升[J]. *理论视野*, 2025(2): 75-81.
- [14] 徐冠清,崔占峰,余劲.乡村振兴背景下村落共同体何以重塑?——农村集体经济治理与减贫耦合的双重视角[J]. *内蒙古社会科学*, 2023(2): 126-133.